

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

庞玉洁/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庞玉洁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8

(学者文丛)

ISBN 7-80696-052-X

I. 开... II. 庞... III. 商业史—研究—天津市—近代 IV. F7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0878 号

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

庞玉洁/著

出版人/刘文君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天津新华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5 字数 220000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696-052-X

定价:12.80 元

序

陈
振
江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有关通商口岸和近代文明传播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相继发表出版了一些颇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论文与著作,扩大了近代史、城市史和地域史研究的新领域,并对中国早期近代化与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的研究和理念的创新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这一领域的队伍也逐渐扩大,发表的宏论佳作随之增多。庞玉洁博士的大作《开埠通商与近代天津商人》,正是这类前沿性研究的佳作之一。犹为可贵者,作者独辟蹊径,撇开前人多从宏观、微观或个案解读天津城市史的路径与理念,而创造性地以“中观”的研究方法,从整体上论述近代天津商人群体与天津城市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互动发展的历史轨迹,全面系统地剖析天津开埠通商后,天津传统商人向近代资本主义新式商人转变的路径和模式;深入探讨新式商人群体的组织结构的更新,及其在天津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贡献;进而得出天津资本主义新式商人群体是天津早期近代化的主要力量的明确结论。由此可以看出,这部佳作的中心议题是明确地提出并回答了天津

早期近代化的主要力量是“社会人”，其中新式商人群体及其商会组织是天津早期近代化的中坚力量，他们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而成为天津传统社会向近代转型即天津近代化过程中的主要动力资源。因此，作者强调：“在人与社会所结成的这种互相制约、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中，相对社会而言，人是唯一能动的因素，因此，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这一新颖命题的提出和深刻的论述，清晰地展示出作者独具慧眼，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深入探讨天津近代商人群体与天津城市向近代转型的互动关系的深层面，并以敏锐的新视角着重阐述近代新式商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商人组织的近代化，以及天津城市近代化和近代社会文明的传播等问题。而且论证周密，新意迭出，结论确有见地，令人耳目一

新。可以说，此项研究旗帜鲜明地把近代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天津和新式商人群体为主体的天津近代化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一定意义上说，也为通商口岸和近代文明传播的研究领域开拓了一个新局面。

为读者评议之便，仅举以下几点实例略作介绍：

一、作者认为，近代新式商人结构的多样性，包括近代新式工商业者、洋行买办、近代企业家和投资于新式工商业的某些官僚和军阀等。随着新式商业的不断涌现和工商兼营现象的日益普遍，商人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商人的涵义也从商业扩展到工商两界，商人的结构也因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有了“新与旧、传统与近代”之分。然而，新式商人群体在天津近代化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近代工商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天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并在和洋商与洋式企业长期接触中，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成为推动天津近代经济、文化和社会文明发展进步的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新式商人群体为天津近代化和近代文明基地的形成与发展颇多贡献，并在近代化运动中塑造其自身的新式形象。

二、作者认为天津商会的建立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商人自治的愿望,也使商人的组合体得到全面更新。作者详细论述了商人组织结构的更新(即改变旧式会馆、公所等旧式商人组织,建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天津商会),是如何使天津新式商人群体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继而积极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抵制外来经济渗透、保护工商者利益、提倡自由竞争和社会改革、引进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等。作者认为,商会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的商人会馆和公所内部所存在的封建性的等级制度,开始呈现出一些近代民主化的色彩,如自愿参加的原则、民主选举的原则、平等议事的原则和民主监督的原则等。近代天津商人所以能够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和影响,与其组织结构的更新和天津商会的大力推动及其顺应民主、平等的时代潮流等积极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作者以典型的事例进一步阐述随着天津商会自治精神的形成和组合体制的变革,在不断完善商人组织系统的同时,为天津近代城市社会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进步所做出的突出贡献,阐释得当,叙述简练而明快。

三、作者强调天津新式商人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产生和发展同步进行的;随着传统商人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洋行的大量出现和买办阶层的形成。买办制度的建立则直接导致买办向商业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的转化,而成为近代天津的第一代新式商人。这类论点虽为当代学人所论及,但是作者依据大量的史料和天津的具体情况而深入论述,不但增强了其论点的说服力,也从不同的侧面阐释了天津买办商人的特点与贡献。

仅从以上三个方面的简要介绍,足可看出这些生动而深刻的论述,清晰地展现了近代新式商人、商会与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轨迹。尽管某些论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但是总体上的研究思路和开创性的新观点是瑕不掩玉的。特别是对近代天津新式商人群体与组织结构的演变及其推动天津近代化经济、文化和社会文明的发展的深刻论述,颇有启发性和创新精神。这部力作

是庞玉洁女士的博士学位论文。几年来,她以锲而不舍的精神细心钻研,搜集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和海关档册等珍贵资料,并且条分缕析和认真鉴别、谨慎引用;她既不堆积史料,也不作无谓空谈,所提出的每一个新观点都有坚实的史料为依据,经得起考验,而且颇有新鲜感。她对这个研究领域的状况很熟悉,对每篇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都认真阅读,并做出简括、得当的内容提要,因此她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得出新结论,并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的答辩,获得南开大学史学博士学位。我作为庞玉洁博士的指导教师,由衷地为她的成就和荣耀而祝福!为这样一位品学兼优的学子而骄傲!在这篇博士学位论文付梓之际,我作为第一位读者而为之心潮澎湃,特撰是文以为序。

2004年3月5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开埠前的天津旧式商人	17
一 水运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天津传统商业的兴起	17
二 天津旧式商人群体的形成及其结构特征	31
第二章 开埠通商与天津新式商人的产生	51
一 被迫开埠与天津对外贸易的兴起	51
二 买办制度的建立与天津新式商人的产生	63
第三章 开埠通商的扩大化与天津新式商人群体的形成	83
一 交通运输环境的改善与开埠通商的扩大化	83
二 近代工商业的繁荣与天津新式商人群体的形成	99
三 天津新式商人的近代化倾向	119
第四章 商会的建立与天津商人组织的近代化	142
一 商会与近代天津商人自治模式的建立	142
二 商会与近代天津商人组合体制的革新	152
三 以商会为纽带的近代天津商人网络的形成	162
第五章 商人、商会与天津城市社会经济的近代化	174
一 商人、商会与天津城市经济的近代化	174
二 商人、商会与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生活的进步	190
附录:本文引用及参考文献资料举要	223
后记	227

导 言

一

人类社会一直就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每个社会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着自己以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罗荣渠先生从历史学的角度,把人类社会的变迁划分为两类,即微型变迁和巨型变迁。所谓微型变迁是指发生在同一社会形态或同一生产方式内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累性的渐变;所谓巨型变迁是指突破社会经济形态或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深刻的社会革命^①。发生在近代的所谓“现代化”运动,就属于后者。具体地说,是指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这一变革是以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推动力,从而突破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社会各领域,并最终导致社会走向全面进步的过程。

由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不同,因而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并不尽相同。一般来说,有两种,即内源性现代化过程和外源性现代化过程。所谓内源性,是指源发于社会内部自身的变革过程,外来影响居于次要地位;而外源性是指在国际环境的影响下,受外部冲击而引起的社会内部的政治和思想变革,并推进经济变革的过程^②。中国属于后者。具体地说,在空间上,中国是“在

①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

② 同上,第123页。

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新兴民族主义勃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从而引起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①。在时间上,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840年到1949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阶段和1949年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前者往往又被许多学者称为“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

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外力作用的推动下开始的,因此,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标志着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起点。鸦片战争以前,虽然在中国的沿海沿江等重要交通枢纽地区确曾出现过商品经济的繁荣,在手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这一切都未能使传统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质的变化,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开始大规模地涌入中国市场,它一方面使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发生动摇乃至瓦解,另一方面也刺激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迫使中国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庸。最先被殖民主义者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的是那些在不平等条约下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据统计,自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辟“五口通商”开始,到民国初期为止,中国相继存在过八十多个通商口岸,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为自开口岸,其余均为约开口岸(Treaty Port)。这些通商口岸作为输出初级农矿产品和输入资本主义国家鸦片和工业制成品的集散地,既是半殖民地化较为深重的地区,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启动较早、发展较快的地区。陈振江先生把这八十多个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以及西南、西北和东北边疆的约开口岸划分为六个近代文明较为发达的地区:即上海和长江口地区,广州和广东地区,武汉和两湖地区,烟台、青岛和胶东地区,天津和冀东地

^①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页。

区,营口、大连、沈阳和辽南地区^①,不仅揭示了通商口岸在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示范作用,而且开辟了“通商口岸与区域近代化研究”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

天津,作为冀东地区乃至中国北方近代化运动的先锋,即为我国近代在外力作用下迅速崛起的通商口岸中的典型代表。开埠之前,天津虽然依仗着漕盐这两大经济支柱,早在明中叶就已成为南北货物交汇的重要场所,但由于其自身的生产力发展得还很不充分,社会经济中商品化程度还很低。因此,其商品经济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封建政府的扶持。在政治上,直到鸦片战争以前,也只是一个近畿的府属县城,人口只有十九万左右。1860年被迫开埠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天津城市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从一个以自然经济为基础,商品流通仅局限于国内市场的封建内贸型商业城市,一跃而变为一个以外贸为先导,沟通华北传统商品市场与国际商品市场之间联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工商业城市。近代天津对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带动并加快了整个天津城市早期现代化的步伐,而且惠及与天津的进出口贸易紧密相连的华北、东北乃至西北地区的许多城市。应该指出的是,天津也同其他受资本主义侵略和掠夺的通商口岸一样,在其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未能摆脱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附庸的地位。但不管怎样,天津这个中国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在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和拯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毕竟较早地开始了自己近代化的过程,并且仅次于上海,一直走在其他通商口岸的前面。

尽管开埠通商使天津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这并不是侵略者的本意之所在。那么,天津城市的早期现代化到底是依靠什么力量实现的呢?

^① 参见陈振江:《通商口岸与近代文明的传播》,载《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2页。

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都离不开人的活动。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在人与社会所结成的这种相互制约、互促共进的辩证关系中,相对于社会而言,人是惟一能动的因素。因此,社会的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虞和平先生把参加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人群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第一,能够进行统一部署的领导阶层和国家政府;第二,时刻准备接受革新创造的现代精英和利益集团;第三,具有现代化意识的人民群众。这三者缺一不可。但就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而言,他认为,处于中间层次的现代精英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尤其突出,因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是在完全传统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在突然破门而入的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而逐渐开始的,所以首先步入现代化行列的不可能是建筑在传统社会制度之上的旧政府,也不可能是生活在传统社会结构之中的一般群众……只能是那些较早较多地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社会上层人士。他们或是政府中的开明官员和改革派,或是知识分子中的改良派和革命派,或是工商界中的买办商人和新式资本家”^①。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过程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纵观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过程,那些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新式商人,不管他们的动机如何,但他们始终在天津的近代化运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人既包括伴随着洋行的出现而产生的买办商人,也包括从传统商业中走出来的旧式商人,既包括投资于新式工商业的某些官僚和军阀,也包括在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近代企业家。一方面,他们作为工商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在逐步摆脱封建因素的束缚,向近代资本主义商人过渡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天津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大多生活在租界,长期与洋商及洋式企业打交道,较早较多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制度、

^① 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9、20页。

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实践者和传播者。尽管他们还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过渡性的痕迹,但确已成为近代天津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近代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任何孤立的个人或分散的群体都无法对社会施加很大的影响,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从事大规模的社会活动。近代天津商人之所以能够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能量和影响,与其组织结构的更新有着密切的关系。伴随着清末重商主义的兴盛,在“新政”中应运而生的,代表天津近代所有工商业者利益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天津商会,既是天津开埠以后社会经济近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天津社会经济近代化的推动力量。尽管它还尚未彻底摆脱封建因素的影响,但已完全不同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会馆、公所等旧式商人组织,它在抵制外来经济渗透,保护工商业者利益不受侵犯的同时,竭力引进和传播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在用严格的行会规约约束同业的同时,也大力提倡自由竞争和改革创新,从而不仅为天津商人自身的近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氛围,而且带领着近代天津商人在整个天津城市社会经济早期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考察和研究开埠前后天津商人自身的新陈代谢过程以及商人和商会在近代天津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天津城市的近代化过程,总结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经验,更好地发展天津的各项事业,加快实现把天津建成中国北方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国际港口大都市的宏伟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

要研究商人,首先要搞清商人的概念。从历史上说,尽管商人的“商”字,起源于原始时期交易活动较为频繁,位于今河南商丘南部地区的“商”部落,但直到周朝,商人的概念才因“士农工商”的等

级划分而被固定下来。传统的商人概念仅指贩卖货物之人。近代以后,随着各种新式商业的不断涌现和工商兼营现象的日益普遍,商人的范围也随之扩大。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商人通例》,规定凡从事买卖、赁贷、制造、加工、水电、煤气、出版、印刷、金融、信托、劳务承揽、旅店、堆栈、保险、运输、托运、牙行、居间、代理等业之人,只要是业主、投资者或经营管理者,都包括在商人范畴之内。从此,商人的概念在法律上获得了确认。应该指出的是,近代以来,不仅商人的涵义已从商业扩展到工商两界,而且商人的结构也因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而有了“新与旧”或“传统与近代”之分。一般来说,旧式商人是指那些从事传统商业的商人;而新式商人则是指那些随着对外贸易的兴起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从事近代新式工商业活动的商人。此外,由于近代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因此即便是那些从事新式工商业的所谓新式商人也必然是一个带有过渡性的商人群体,在他们的身上,既具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封建主义的痕迹。

近代中国商人及其社团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一个新开辟的领域。近十多年来,随着天津、苏州、上海等地商会档案的相继出版,有关近代商人与商人社团研究的论文和专著已有了一定的积累。就全国性的整体研究而言,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马敏的《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都是高水平的近代中国商人研究的代表作。前者主要揭示近代中国商人是怎样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进行分化和重新组合的;后者主要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的,并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初始阶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绅商阶层。通过对其成分结构、属性、社会功能以及政治参与等各个侧面进行分析与探讨,从宏观上揭示这一过渡性商人群体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形象。关于近代商人社团的研究,商会方面研究的代表作有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

出版社 1993 年版)和朱英的《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社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虞和平的著作在考察商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商会的内部与外部关系以及商会在中国近代化中所发挥的政治与经济作用。朱英的研究则侧重于探讨商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一书,把近代商人社团的研究从商会这一经济类商人社团进一步扩大到文化教育、学术研究、社会生活等各类商办社团。关于地方商人与商会的研究,近年来也取得了相当的进展。特别是上海、苏州等地的商会研究,成绩显著,不仅发表了大量论文,而且还有商会研究的专著出版,如马敏与朱英合作完成的《传统与近代的两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巴蜀书社 1993 年版)和徐鼎新的《上海总商会史,1902 - 1928》(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等。

作为近代以来北方工商业中心的天津,尽管其商会研究尚未有专著问世,但近年来随着《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的整理和出版,与此相关的论文已有了一定的积累,代表作如胡光明先生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1986 年第 4 期)和《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1989 年第 5 期)。前者在考察商会主要成员的社会成分和经营状况的基础上,分析了 1912 年以前天津商会的性质和作用;后者揭示了 1912 年至 1928 年天津商会的历史沿革与内部政权关系的演变。此外,宋美云的《试论民国初年天津商会的参政活动》(陈振江主编:《辛亥思潮与国情》,天津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和《北洋时期天津商会政治文化试析》(《城市史研究》第 11 - 12 辑)、《20 世纪初天津商会的对外交往与城市经济发展》(《南开经济研究》2000 年第 3 期)、《近代天津商会与国内其他商会网络关系的构建》(《中国经济社会史研究》2001 年第 3 期)等文章,分别论

天津商会的政治文化以及天津商会的对外交往,与.....述了北洋时期其他商会的网

研究则显得薄弱。首先,关于近代天津商人的研究,主要停留在个案研究的层面上。其中所见最多的莫过于对以周学熙为代表的近代天津官僚型绅商的研究,如:郝庆元的《周学熙与天津工业近代化》、《周学熙与天津早期工商业的发展》,日本学者滨口允子的《周学熙与农工商行》,黄清根的《周学熙企业管理思想简论》、张洪祥、马陵合的《略论周学熙实业集团的经营管理思想》、唐少君的《周学熙与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等。此外,还有对以范旭东、宋秉卿为代表的在新式教育体系下成长起来的近代天津企业家的研究,如《范旭东与泰罗管理思想比较》等,但为数甚少。其次,关于商人群体的研究,多集中在以盐商为代表的旧式商人身上,如张增元1986年发表在《天津史研究》上的《天津盐商一窥》一文,概括了天津盐商的起源、盐商阶层的形成及开埠前盐商在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海外学者关文斌的近作《文明初曙——近代天津盐商与社会》,把天津盐商的研究延伸到20世纪初,反映了盐商从旧式商人向新式商人转化的过程,但也只限于盐商这一个阶层。从整体上说明近代天津商人与天津城市发展问题的专题研究,尚属空白。

本研究试图将近代天津商人与近代天津城市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系统而具体地说明自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以后,近代天津商人是怎样随着对外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新式工商业的崛起而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逐步改变经营方式,由封建商人向资本主义商人过渡的,又是怎样在天津商会这一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式商人社团的领导下,随着其自治精神的形成和组合体制的变革,在不断完善商人组织系统的同时,为近代天津城市社会经济的早期现代化和社会生活的进步做出贡献的。

二

尽管本课题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然而现存的档案史料又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首先,近年来出版的大量档案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陆续由天津市档案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天津市工商联共同整理出版的《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50),共10卷本。《汇编》不仅完整地记录了天津商会自身从诞生到消亡的全过程,记录了津京地区商业市场的兴衰和旧式商业向新式商业过渡的历史过程,记录了天津地区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的历程,而且全面地反映了近代天津商人在商会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天津城市的政权建设、市政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情况。此外,其他各类档案,如《清末天津海关邮政档案选编》、《袁世凯天津档案史料》、《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天津租界档案选编》等,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清末民初天津城市发展的概况。

其次,近代天津出版的各类报刊,如天津《大公报》、《益世报》、《商报》、《河北工商月刊》、《广益丛报》、《天津市周刊》、《天津市政周刊》等均刊有有关近代天津工商业发展、天津商人、商会活动及近代天津城市市政建设、对外贸易、教育文化事业、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发展状况的丰富资料。

再次,建国后由天津市政协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和《天津文史丛刊》以及由天津市工商联与民建天津市委员会联合出版的《天津工商史料选辑》中所刊载的大量丰富、生动的口述资料,不仅为本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笔者对近代天津商人乃至近代天津城市发展的理解和认识。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由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整理的《天津历史资料》载有大量未曾发表过的有关天津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历史的文献档案和调查报告,对本研究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除以上所列举的文献资料以外,现已完成的有关天津史研究方面的成果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首先,有关近代天津城市史的出版,如 20 世纪初由英国人雷穆森编写的《天津—插图本史纲》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写的《二十世纪初天津概况》以及近期由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写的《天津简史》、来新夏主编的《天津近代史》和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等,不仅从不同的角度勾画出了近代天津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时人及作者本人对近代天津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状况的理解和认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90 年代出版的由罗澍伟先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它突破了以往天津史的研究框架,首次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在阐述开埠前后天津城市功能的演变过程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生活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各阶层的人们的实际生活状况,对本论文的完成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其次,各类专项研究的出版,如李天佑主编的《天津铁路历史概况》、段传俊主编的《天津邮政 100 年》、李华彬主编的《天津港史》、孙丙湘主编的《天津公路史》、耿捷主编的《天津公路运输史》、沈大年主编的《天津金融简史》、刘泽华等主编的《天津文化概况》、高仲林主编的《天津近代建筑》、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孙德常主编的《天津近代经济史》、姚洪卓主编的《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张大民主编的《天津近代教育史》、尚克强、刘海岩主编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等,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的启示和间接的帮助。

四

基于上述认识,笔者将当时出版的各类档案、地方志、报刊、杂志等书面资料,与新近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和工商史料丛刊中所蕴藏的丰富生动的口述资料,这两类原始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相互的补充和印证,在借鉴近代学者有关商人与商会研究方面的一些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力图对开埠前后天津商人的发展过程做一纵向考察,与此同时从横向上阐明近代天津商人、商会与近代